

# 馆长朱进

“宇宙这么大,地球这么小,所有人都在关注地球上的事,只有天文在关注地球以外的宇宙。地球之外,时间和空间是巨大的。”



■本报见习记者 吴益超

朱进的人生,似乎除了天文还是天文。作为现任北京天文馆馆长,只要有机会,朱进都会奔走于全国与世界各地各个观测点和天文台,充满好奇心地去仰望星空,研究宇宙的往事。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学天文。工作之外,他也抽出时间,通过微博、采访或讲座,积极而耐心地向公众解释日食、流星、超级月亮、黑洞等各种天文现象,甚至是UFO和外星人。他没有排场与架子,只有对天文学永不降温的热爱。这位操着一口京片子的“60后”大叔,刚刚获封科学传播人“年度新锐”,被公认为天文科普圈里的“大腕”。他的热情逐渐感染了一批天文爱好者,后者称他为“馆长”,这里更多了一层亲切的含义。

Senior  
先生

# 白虎星照命

杨宪益生肖属虎。杨先生说,他出生的时候,母亲曾梦到有只白虎扑怀而来,算命先生就说这孩子是个白虎星,是吉兆亦是凶兆,将来有可能成就大事业,但恐怕人生也会经历很多磨难。

■刘果

偶然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愣了一会儿,脑中闪过一个美好的词:鹤发童颜。我不认识照片上这对男女,只是觉得很少见到他们这样恬静沉毅的脸,真好看。看完才知道,原来这就是那对大名鼎鼎的翻译家、杨宪益生先生与夫人戴乃迭女士的合影。杨宪益,熟悉这个名字的外国人远多于中国人。他是最早把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译成英文的作家之一,他与夫人戴乃迭女士合译作品,从先秦散文、诗经楚辞到《史记》、《水浒传》、《红楼梦》、《鲁迅全集》,至现当代文学作品等百余种,蜚声海内外。他被称为“翻译了整个中国的人”,实至名归。关于戴乃迭女士,资料里都把她称为戴乃迭先生。资料里说,杨宪益1934年赴英留学期间,与戴乃迭相识相爱。随后这位英国淑女追随他的中国丈夫来到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她不仅学会了中文,会写一笔正楷小字,还能仿《唐人诗话》用文言写小故事,文字娟秀。这对伉俪之间的故事一直是中国文学界一段佳话。他们两工作时常是这种情形:由杨先生把中文书口译出来,戴女士把它记下来,然后两个人再一起从词源。他们的翻译事业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珠联璧合、不可替代。

豪门虎子历磨难

杨宪益的自传《White Tiger》曾在全球各地出版,有意思的是,各地版本的中文译名都不相同。《White Tiger》在意大利出版的时候,书名是《从富家少爷到党员同志》,题目里透露出的是基于财富与政治的个人命运;在大陆出版的中文版本是《漏船载酒忆当年》,是知识分子那种顾左右而言他的隐晦;到了笃信风水命理的香港人那里,书名就变成了很宿命的《白虎星照命》。何谓白虎星照命?杨宪益生肖属虎。杨先生说,他出生的时候,母亲曾梦到有只白虎扑怀

理想照进现实

北京天文馆坐落在北京动物园与一个大型服装批发市场之间,后者平日几乎是人山人海。与天文学所倡导的科学、求知精神不同,往来此地的游客与商贩们更关心的是现实利益,这仿佛形成了一种宁静与喧嚣的极端对比。2002年,朱进被任命为北京天文馆馆长。当了10年馆长,他觉得自己越发像一名科普工作者。

科研转科普,朱进“感觉还可以,没有太不适应的”。科研工作期间,他也做过一些科普工作,接触过不少天文学爱好者。

做科普,朱进有自己的一套。1999年,水木清华BBS(当时中国最有人气的网络论坛)成立的时候,朱进就是第一任天文版版主。就像今天在微博上一样,他做科普的同时,也从别人那里学到很多。

但是,作为对整个国内天文学科负有重要责任的国家一级博物馆馆长,怀揣天文学理想的朱进要面对的是更大的现实——增进国人对天文学的理解。

“整体来说,还是有很多人对于天文学是完全不了解的。不能说是大家不重视,应该说,他们完全不知道天文学是什么,是干什么的,这都需要我们努力去做工作。”

但这是一条路漫漫而修远的工作,必须从点点滴滴做起。

天文必修课

每周,朱进都会组织人们,尤其是青少年去观测天文现象,体验天文,增强互动。

一旦天文学界有了什么新闻,比如日食、流星雨以及类地行星、最年轻黑洞的发现等等,朱进都会第一时间作出解答。同时,他还兼任《天文爱好者》杂志主编,定期组织青少年参加国内、国际的天文学竞赛。

“以前那些参加奥数的小孩,上了大学也开始学专业的天文了,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学生喜欢天文。”朱进感慨,中国一直有一些真正对天文感兴趣的孩子。

“这一点与美国不同,他们的年轻人对科学感兴趣的越来越少,而有兴趣的又有很大一

部分转向商科。”回顾这10年来的天文科普成就,朱进说,“这个现象在中国倒是没那么严重,说明我们的科普工作虽然落后于发达国家,但至少做得不差。”

不过这样还不够,朱进把目光放在了更远的将来。

“我们希望做好的,就是中小学天文学教育工作,比如让这些学校开设天文课。”

不久前,朱进刚刚在北京市海淀区图强二小参加了北京市首届小学天文校本教材研讨会。他希望将来每一个学校都开设天文课,“不是当做副科,而是像语文、英语那样的必修课。”

“我个人认为,天文学科无疑是所有学科中最重要。它能培养人的不光是科学素质,还有各方面的素质,比如创新精神、学习精神以及对生命和宇宙的敬畏。”朱进表达出了一种豁达而乐观的态度,“如果若干年后,每个人都学天文学,无论对科普还是国家研究,都将是一个重大的飞跃。”

朱进的彗星

朱进对天文的强烈兴趣就来自于他的一位中学老师。从那以后,他的人生与天文就再也分不开了。

16岁考上大学,直到1991年从南京大学博士毕业,10年间,他拿到了天文学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接触越多,越是对学天文感兴趣。”朱进说他当时对未来也没什么规划,就是想学天文做天文,“家里倒没什么反对”。

毕业后,朱进入入天文学人生的第二个10年——任职于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后改为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做一名研究员。从助理研究员到副研究员、研究员,再到北京天文台博士后流动站的博士后,对朱进来说,这段岁月并不单调。

1995年,朱进偶然间发现,一些有可能是小行星的东西,似乎聚集在第九号小行星尾部,这个细节最后促成了他主持北京施密特 CCD 小行星项目计划(“BATC 巡天”项目一部分),这是当时世界第五大小行星观测计划。

到2001年止,该计划共发现了获国际小

行星中心暂定编号的小行星2700余颗,其中已有1214颗获得永久编号和命名权。包括后来被命名的中科院星、朱光亚星、贝时璋星等小行星,都是在那个时候由朱进的项目组发现的。

对研究天文的人来说,也许朱进是幸运的——作为小行星项目计划的负责人,他得到了一颗用自己姓氏命名的彗星——“朱-巴拉姆”(Zhu-Balam)。

命名的过程,却是一波三折。它是当时整个项目组发现的唯一一颗彗星,不过由于观测时的运动轨道比较接近小行星,这颗星体最初是以“朱-李”的名字命名。

朱进和项目组的谁都没看出来这是彗星,“因为在观测的那一段时间内,它的运动轨道特征比较接近小行星”。

但在后续的跟踪观测中,一位来自加拿大的同行却发现了它的彗星特征。“这在国际上是一遭。”朱进说。

经过讨论,最终以发现地名“兴隆”(北京天文台兴隆观测站所在地,位于河北省东北部)命名。

至此,朱进似乎失去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彗星。但有趣的是,那年欧洲的一个天文项目组也发生了类似的事——发现者未发现星体的彗星特征,却由跟踪观测者发现。

同样特殊的事件,在近乎同一时间内发生两次,这让国际天文联合会犯了难。经过漫长的开会讨论后,国际上最终确定,两个项目都采取一个方案:由发现者和后续观测者的名字共同命名彗星。

这颗彗星,由发现者项目组主持人朱进与跟踪观测者大卫·巴拉姆的姓氏共同命名为“朱-巴拉姆”彗星。此后国际天文联合会也作出新规定,若再发生类似的事,也采取同样的方法。

回想起当年这段名失而复得的往事,朱进显得很平静。对这些名分,他不是那么在意,“这个过程其实我们当时都不知道,等国际公告一出来,都是第二年一月份的事了”。

采访的最后,朱进说了一句很浪漫的话:“宇宙这么大,地球这么小,所有人都在关注地球上的事,只有天文在关注地球以外的宇宙。地球之外,时间和空间是巨大的。”

后又加入了共产党。他始终保持着派天真,从来不是个真正能够搞政治的人。

故事讲到这里,还是轻松有趣的。可是杨宪益的后半生,随同那个动荡的年代,逃不过风雨飘摇。

杨先生为人乐观。在“文革”的时候,他与太太一同被抓,被打成“外国特务”。他最为恐慌害怕的不是被批斗,而是与太太被分别囚禁,彼此不知道对方怎么样,他甚至出现了幻听。

杨宪益回忆中的“文革”,有着黑色幽默式的荒诞。他说:“我最不喜欢自己被单独批斗,因为很闷,但是大伙一起被批斗,就会觉得很好玩。”那时候大家一起坐牢,他们还玩起了虱子。传说北方的虱子,无论把它放哪儿,它都会往北走。他们一群人就把身上的虱子抓来试试看是不是真的这样,果然如是。

白首同归我负卿

杨宪益出狱后不久,戴乃迭也被无罪释放了,在政治高压的年代里,这对异国夫妻付出的代价无疑是巨大的。

其实早在杨戴两人结婚之前,双方的母亲就对这门婚事十分担忧,乃迭的母亲琳娜更是激烈反对,她竟然对女儿说:如果你肯结婚,你们的婚姻持续不了4年,而你将来的孩子会自杀而死。结果,杨宪益最疼爱的儿子杨焯在“文革”期间因为精神分裂,用汽油点火自焚。

一语成谶!

杨宪益的挚友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儿子的去世,使戴乃迭遭受了一生中最大的打击。”这也成为一生恩爱的杨戴二人之间永恒的隔阂。戴乃迭始终认为杨宪益在儿子的叛逆期忙于政治,疏忽了孩子。乃迭忠于自己的选择:杨宪益和中国,从未后悔和动摇,无论战乱、流亡、贫困……直到儿子的死亡,她开始怀疑自己所付出的一切,内心深处,她更因为母亲当年的预言应验而深感挫败。

从此他们看淡一切身外之物,把收藏的明清字画全部无偿捐献给故宫等处,几十年间出版的百十种著作也大多送了人。坎坷的人生和深重的磨难,从未改变过他们正直的品格和忧国忧民的胸怀,富有传奇色彩的生涯也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艰难曲折路程的一个缩影。

晚年的戴乃迭受困于老年痴呆症,杨宪益与她寸步不离,朋友们去看望她,她有时已认不出他们,但她一直微笑着,白色卷发松软地围着老太太泛红的脸。

乃迭去世后,杨宪益作了一首悼亡妻: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结发精兼贫贱履,陪身围困死生轻。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Face  
面孔



# 加藤嘉一:中国“公知热”的背后

百度词条这么定义“加藤嘉一”——一个日本人,用中文为国际化媒体写专栏,试图从“非中国人”的第三双眼的独特视角,解读与中国息息相关的事件、现象和问题。

加藤嘉一,被日本媒体称为“在中国最有名的日本人”。1984年生于日本伊豆,2003年4月非典高峰时来到中国。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客座研究员。

自从2005年4月亲历“反日游行”开始,加藤嘉一一直在海内外媒体发表言论:钓鱼岛、两会、欧债、奥运、日本地震、中国改革、微信,由此受到广泛关注。在公众的印象里,这是一名贴着“公知”标签的“意见领袖”。

唐骏学历造假曝光后加藤嘉一曾撰文《假文凭的土壤》,抨击中国的造假现象。而现在,他自己也被爆出学历造假的丑闻。

近期出刊的日本杂志《周刊文春》刊登《揭露加藤嘉一伪造履历》一文,称其履历中被东京大学录取的内容是伪造的,并指称履历内容还有数个不实之处。这个游走在中日之间,以国际观察家、成功人士面目出现的年仅28岁的年轻人,被发现说了若干个谎言,名声一夕坍塌。

消息引起了轩然大波,而他本人一直没有回应。11月9日,加藤嘉一终于打破沉默,在其中文微博上发表中文致歉信,承认关于东大的履历系不实之辞。他说:“对于因我的幼稚与不成熟,傲慢与无知,而给大家所造成的误解与困惑,在这里,我深表歉意。我将努力改进自己,成为一个值得大家信任的人。”

美国《侨报》评论认为,加藤嘉一在中国的走红,折射出一种风气:中国现在过分关注和重视这些“意见领袖”、“人生导师”,并将他们偶像化。直到他们被“扒皮”的时候,才有人开始回想,加藤嘉一为什么红起来?是因为他的身份、观点,还是他自己的炒作?

有日媒称,加藤嘉一是在日本说中国的坏话,在中国说日本的坏话”,而现在对加藤嘉一铺天盖地的批评中,也有一条是“投机主义”。我们看到,其中有曾对他的签名信书异常激动的粉丝,也有厌恶他已久、抓住机会批评的反对者。只有一条是没有争议的:说谎是不对的。

而加藤嘉一在中国的道歉至今只针对“考上东大没有去”一件事,其他的疑点他还没有回应。(刘果)



# 陈坤:行走的力量

陈坤那张好看的脸再次上了《南方人物周刊》的封面,不一样的是,这次是以一名公益活动发起者与组织者的身份。

2012年8月,演员陈坤的个人工作室“东申童话”开始组织第二次“行走的力量”。和第一次相比,志愿者从在校大学生变成“各高校应届毕业生和白领”,他们发表声明:志愿者要在行走之后留在青海支教半年。80多人的队伍从下大武出发,开始为期10天的禁语徒步,目的地是海拔6282米的青海阿尼玛卿雪山。

发起这项活动的原因,陈坤是这么解释的:现代社会物质化进程太快,整个社会面临着信仰迷失,他希望通过行走让人们找回内心。更为关键的是,他认为目前通过物质形式进行的慈善活动并不足以满足他的期待,“用内心的力量帮助内心”更重要。

2011年8月,陈坤发动第一次“行走的力量”。地点定在西康,队伍由10名大学生组成,5男5女。这项活动受到了意想不到的关注,报名的人数达到了18000人。

关于如何从这18000名大学生中挑选出那仅有的10名幸运儿,陈坤说标准有两个:一是不能说“喜欢我”,不想因为成成员是影迷影响活动的纯粹性;二是要有韧劲儿。

曾经住在重庆一间破房子的贫穷男孩,随着2003年《金粉世家》的播出一炮而红,金钱和荣誉扑面而来。伴之而来的还有厌恶和恐慌,住在300平大房子的当红小生,开始以步行和保持沉默为乐。2011年拍摄电影《龙门飞甲》时,陈坤曾经蒙住眼睛20多天,以此来体验听觉的提升。

作为一名佛教徒,陈坤心中有强烈的“利他”精神,并将其作为一个基本的心理应该遵守的准则。对待自己的队伍,陈坤大部分时候十分强硬。但偶尔,他也会处在摇摆中,他必须压抑自己的同情心,来完成对信念的坚守:人要学会接受一切既定的事实。(张晶晶)